

## 崇川往事

## 石港名胜二贤祠

□姜松延



二贤祠

石港二贤祠,虽久负盛名,却由于早年被毁,加之史料匮乏,使今人难以一睹其往日真容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笔者寻得一帧摄于1934年的二贤祠旧照,虽因清晰度欠佳而略感可惜,但能在朦胧中一窥其概貌,总算是弥补了长期以来只有文字描述、不见影像资料的缺憾。

其实,石港二贤祠不止一处。其一为嘉靖中石港场人为祭祀繆思恭、繆思敬兄弟所建。而这张图片记录的是广为人知、并砌石围护,故名成山。因位于北极阁之东,又名东山”,而百姓多称之为土山。“至宋代初年,山已高约四丈,广可十亩,山上(山顶西半边——笔者注)盖有一座供奉观世音的庙宇,四周树木蓊郁一片”。

南宋德佑二年(1276),文天祥一行在乘舟前往卖鱼湾准备南渡的途中,夜宿土山庙中。因土山居于石港当时的最高位置,文天祥曾登此观望地形,并以《石港》为题作诗一首,其中“起看扶桑晓,红黄六六鳞”句即是当天早晨作者于土山顶观日出,朝霞如鲤鱼鳞片一般灿烂耀目的真实写照。明嘉靖十三年(1534)春,巡抚御史陈巽峰视察石港场,认为文天祥曾逗留于此,当地应有所纪念,便下令将山上庙中的观音像改为供奉文信国公的神位,并举行了一次祭祀——“文文山祠”由此而成。“先生文章节气,千载伟人。生也不辰,履兹厄运……屡陷虎口,犹思问津海滨,力图恢复;志作诗歌,气吞胡虏。则兹地也固其情所不能忘者”。明代通州籍大臣陈尧所作《文文山祠记》也概括说明了建祠原因。后来,东山亦由此被称为“文山”。清康熙年间,石港场人又于祠前魁星楼墙基上嵌诗碣,即文天祥《石港》《卖鱼湾》和《即事》三首诗的勒石。

另据记载,古代东台、如皋(今如东)、

通州等地濒临黄海,海潮侵蚀,不利农耕。在范仲淹主持下,修建了从楚州盐城经泰州海陵、如皋至通州一线的捍海堰,俗称范公堤。堤成后,“滨海泻卤皆成良田”,江淮平原得以物阜民丰。其时,石港位于“范公堤”内,范公筑堤,深得民心。清乾隆元年(1736),石港场盐课使王文正在文文山祠内加祀“创议筑堤、御潮捍患”的范文正公(仲淹),并新塑范、文二公神像,改祠名为“范文二贤祠”。至此,乡民常年祭祀,香火不绝。

“高高书院建山巅,上得山巅谒二贤。祠宇巍峨碑不朽,每逢甄别爱留连。”这是清代嘉道年间诗人周应雷在其《渔湾竹枝词》里描写二贤祠的诗句。不难想见,几经扩建、修葺,此时的文山及二贤祠已成一方名胜。明嘉靖十八年(1539),通州运盐分司韩守彝不仅在山顶东侧新建了土山庙和魁星门楼,还扩建了山上的原祠宇,并在二贤祠前种植了两棵银杏及多种树木。而“瓣香、翠云两楼,结构精致。登楼环顾,绿水青山,尽收眼底”。可见,文山虽然并不高,但楼阁巍峨壮观,树木郁郁葱葱。关于二贤祠的外观,除这张老照片,还有以上文字记述。至于其内部陈设,据载祠内有塑像四尊:上首是范文正公(仲淹),右边同坐文信国公(天祥),便装彩色。另有二神像东西相向,一是杜架阁(许),一是金都监(应),均为文生前随从。大殿前楹柱上为道光年间两淮盐运判官赵祖玉所撰写的对联一副:“齐韩、富、欧为名臣,先忧后乐;秉天、地、人之正气,取义成仁。”韩,韩琦;富,富弼;欧,欧阳修,均为宋仁宗时名臣。“天、地、人之正气”取自文天祥《正气歌》: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,于人为浩然……”联语以此来分别赞颂范、文二公。

因为范文二贤,文山渐成一处人文昌盛之地。明嘉靖二十七年(1548),两淮盐运御史陈其学在二贤祠旁建忠孝书院。清康熙三年(1664),通州盐运司运判杨鹤年重修后更名为文正书院。后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)移建于文山之上。该书院历经

明清两朝,达310年左右,成为南通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。文山还是人们的景仰游观之所。每年农历六月十九庙会之日,来自四乡的善男信女会到此烧香礼拜,人头攒动,香烟缭绕,红烛高烧,颇极一时之盛。穿镇而过的串场河(运盐河)北有一座大慈阁,隔河相望的便是文山及二贤祠,文山与大慈阁上的歌手遥相对歌,这里又成为一处歌墟所在。每到此时,烧香的、赶集的农民,会沿着石阶登山休息纳凉,还可听歌甚至参加赛歌,呈现一派欢乐繁盛的景象。而“文山烟雨”则为“渔湾十景”之一。

作为历史人文景观,二贤祠于民国时期曾得以修缮。据1921年7月2日《南通报》载:当时,“张退公为保存古迹起见,特捐私费修理石港土山(范文正)(文忠烈)二贤祠,以壮观瞻”。工竣后,“于夏历六月一日举行落成典礼,并柬邀本县官绅届期前往与祭……籍崇昔贤”。

1943年春,日伪军于“清乡”前侵占石港,并利用这一全镇制高点为巢穴。他们掘土开壕,构筑工事,不仅使文山西半部的二贤祠被夷为平地,文正书院及东半部的土山庙(文殊禅院)等山上所有古迹也俱被破坏得荡然无存。解放战争中,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据点。可惜这一处名迹几经兵燹,终成荒丘。20世纪60年代,煤矿厂来此运泥,用于拌和制作蜂窝煤等,土山遂消失殆尽。

在石港小学旧址、原学校操场东北角,至今仍存有一座二贤亭。该亭为时任校长朱学柯经多年筹备后,于1990年春在原二贤祠遗址上新建而成。亭呈六角翘檐,缀以葫芦宝顶,覆绿色琉璃瓦,加上红漆梁柱,双狮(石港城隍庙遗物),制于乾隆年间拱卫,尽显古典风韵,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,建成后赢得广泛赞誉。但随着数年前石港小学迁建,如今的二贤亭正置身杂草瓦砾丛中,形同废弃,令人引以为憾。作为一处重要的纪念物,二贤祠已难以重现,但对于二贤亭,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当有必要整理、修缮并予以保护,以丰富地方历史文化遗存,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
## 外商在南通放氢气球做广告

□徐海萍

## 旧文新刊

外国香烟输入南通,约在光绪二十六年(1900、1901),最初有龙牌和称人牌,均十支装,盒内还附有蜡嘴五只。接着,英美烟公司的品海、强盗、大英、前门等牌次第风行。但是1912年以后,群众爱用国货的风气进一步高涨,南洋、华成两公司的出品在市场上取得地位,英

美烟公司的销路不得不受些打击,于是代理商作出通过多种多样的广告扩张销路。

1923年春,协大烟号代英美烟公司发出广告说,某日下午借西公园放氢气球,一时哄传将有人坐氢气球升到上空。到了那天,前往参观的不止千人,不料所放的氢

球并不是下面有篮可以坐人的,却是直径一丈多、外面用绸包的氢气球。它高升空中,停留不动,下挂大幅红锡包香烟广告。大家看了,不感兴趣,一时纷纷散去。而西公园门首同时站立两人,逢人送优待券一纸说明,它可以免费换香烟一包,牌子是大仙女。

## 海陵旧话

## 拼茶诗人于泗(上)

□徐继康

说起拼茶诗人,人们往往会想起蔡少岚、叶晓竺、缪文功、蔡观明这些人,他们都是晚清民国时人。如果问起乾嘉时期的拼茶诗人,会有谁呢?蔡观明在《知非录》中谈及“乡里”时曾这样说:“对于经学有著作的,如徐述夔、缪玉成;对于史学有著作的,如徐国道、周藩;诗名最大的,有于泗、缪中。”今天说起徐述夔、缪中,还有一些人知道,但说起于泗,估计知道的不多。早在民国初年,这位诗名最盛的于泗先生,就已经是“乡人鲜能名之”了。

在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出版的《拼茶史料》上,刊有一幅于泗的画像,画一位书生宽袍缓带,面净无须,目视前方,手持一朵兰花于胸前,神情宁静。图片很小,也模糊,仅看得见“于秋渚诗家遗照”几个字,其余款字太小,根本无法辨认,更看不出是谁的手笔。今天我们想了解于泗的一生,就同观看此图一样,总是斑斑驳驳。

蔡观明在《拼茶人物略》中说:“于泗,字彦邦,号秋渚,监生,善为诗歌,尝手辑《东亭诗》二十卷。事兄恭。颜其居室曰‘怡怡草堂’,即以名集,慷慨好交友,四方游士至止,解囊相赠,虽困死不顾也。”又在《拼茶艺文略》中记载:“(于泗)著《怡怡草堂诗》八卷,《搜神诗史》六卷,《咏物诗》十二卷,《鸥村》十卷(清光绪间乡人刊《怡怡草堂诗存》附《编年诗》一卷)。”今人在介绍于泗时所引用的资料,皆不外乎于此。

于泗的生卒年,并无记载。其实他的生年是可以推算的,他在给表侄顾东林七十岁生日时所写的《题赠东林贤表阮古稀荣庆》中写道:“我母尔祖姑,爱尔自少小。我与尔嬉游,母见每笑倒。兹事尚眼前,韶光倏如鸟。我母逝时多,尔我亦衰老。前岁我逢辰,算尔应在卯。但记尔生年,不记日迟早……”于泗与顾东林年龄相仿,从小一起嬉游。于泗在诗中“前岁我逢辰”,说明他比顾东林大两岁。顾东林生于1750年,则可知于泗生于1748年,即乾隆十三年。其卒年,还没发现记载,他为顾东林作此诗为嘉庆二十四年(1819),其年七十二,尚在世。

于泗的母亲顾氏,是有名的孝妇,她是顾三省的三女儿,嫁于家不久,公公即去世,丈夫及婆母都病倒了,婆母尤为严重。顾氏躬亲药饵两个月,没有任何起色,就偷偷地割了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,煮好了,调和羹汤给婆母吃,谁知食尽病除,婆母竟然得以痊愈。此种割股疗疾,古以为孝行,其实并无科学依据,但毕竟是雍正七年(1729)五月间的事,那时还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感动神灵,能教天意回转,所谓“一诚关至性,便是九还丹”。当时婆母非常感动,说了一句非常朴素又真挚的话:“吾无以酬新妇,愿无似我多病。”后来,顾氏年至七十四岁去世,算得上“寿且考”了。她声名远播,被称为“海上孝妇”。乾隆年间,江苏学政彭元瑞以“孝范闾型”四字式其闾。她的生平事迹,为县志所收录。在嘉庆《扬州府志》卷五十九《人物·节孝》的同一页之内,顾氏竟被记录了两次:“监生于二禄继妻顾氏”“于公慎妻顾氏”,这个小小失误在嘉庆二十二年的《东台县志》里才得到纠正:“新《府志》公慎即二禄。”熊琏在《澹仙诗话》中也有“于秋渚母顾夫人,慎斋配”的记载,《顾氏家乘实录》在《顾三省小传》中记述了“三适太学生于在中。”综述可知,于泗父亲叫于在中,又名二禄,号慎斋,是个监生,顾氏是他的继室。所谓“公慎”应为“于公慎斋”之误。母亲去世后,于泗为了彰显母亲德行,遍请诗坛名流为之题诗,一时题赠如云。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有孙乔年《拼茶于节妇割股诗》、李斗《作歌赠于秋渚》、赵怀玉《于孝妇诗》,还有钱德怀、朱荣棠一些人的诗。题诗前后跨度四十年,说明于泗终生为此事奔走不息。

顾氏有四个儿子,于沼、于滨、于润和于泗,兄弟四人个个文才出众,人称“于门驷马”,尤以于泗才气最高,名气也最大。《拼茶艺文略》中,排在于泗之前,记有“于治,字敬式,号茗坡,著《柳园遗草》”。《扬州府志》与《东台县志》记载“于沼著有《柳园遗稿》”,看来于治就是于沼,应该是蔡观明笔误了。熊琏在《澹仙诗话》中也提到了于沼,说他“性疏懒”,写诗不存诗稿,幸亏于沼为其缀拾残编,才得诗三十余首,有《种梅》《赠道桐门道士》《湖上》《过淮提庵》《感怀》诸诗,可惜于今不见流传。今天能够看到的,是他在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为《符氏宗谱》撰写的一篇序文,同时作序的还有他的三弟于润。于润,字石门,是顾东林的业师,他曾经为舅舅顾五贵(即顾东林祖父)撰传。幼时,于润随母亲到舅舅家,顾五贵指着他说:“此子器宇不凡,端吾家宅相也,他日当大有所成。”关于老二于滨,记载不多,但县、府志里都记载了他的妻子周氏,也曾经割股疗祖姑疾。于泗十六岁时,大哥于沼、三哥于润就有资格为乡里家谱撰文作序,看来,这几位哥哥比于泗年长不少。